

百团大战：举世瞩目的战略性进攻

■张 馨 张征鸿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及地方武装在华北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0次以上，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攻克据点2993处，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百团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囚笼政策”，遏制了国民党对内对日妥协倾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浴血奋战，振奋人心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趁德国法西斯在欧洲迅猛扩张、美国战备尚未完成、英国又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南进”政策，企图攫取英、美等国殖民地。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同时以主力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为粉碎日军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心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参加此次战役的，有晋察冀军区部队、晋西北的第120师部队、晋冀鲁豫区的第129师部队及山西新军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还有广大民兵和群众参加，故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

战役共分为三个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为战役第一阶段，任务是破坏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夺占沿线日军据点，打击前出“扫荡”的日军。参战部队充分发动群众，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各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灵活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攻坚战，掌握了破路与战斗结合、袭击与围困并用等多种战法，对路轨、车站、桥梁、隧道、通信设施等全面破击，重点是正太铁路，及平汉、同蒲等铁路和一些重要公路。在我军各部的猛烈攻势下，阳泉制高点狮脑山和“晋冀门户”娘子关等要点要隘接连被攻克，华北日军的主要交通线陷入瘫痪，日军控制的井陘煤矿也被严重破坏，停产达半年之久。

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为战役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在继续破坏交通线的同时，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日军据点。参战的我军各部奋勇出击，连续攻克多处日伪军据点，并在广大抗日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平毁了大量封锁沟、墙，沉重打击了伪政权组织，使很多被分割的根据地重新连成一片。

从10月6日到翌年1月24日为战役第三阶段，中心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大规模报复“扫荡”。从10月初起，日军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抗日根据地遭到重大摧残。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参战部队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坚持灵活多变的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坚决消灭来犯之敌，最终迫使敌撤退，收复被侵占的全部城镇，取得战役的最后胜利。



1940年8月，八路军攻占娘子关。



八路军战士坚守在山西阳泉西南方向狮脑山阵地上。



抗日根据地群众热烈欢迎参加百团大战的将士们凯旋。

取得战役的最后胜利。

救亡图存，砥柱中流

在风云压城的至艰时刻，百团大战犹如一声惊雷，划破暗夜、照亮天空，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百团大战遏制了国民党对日的妥协倾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谋的是一党私利，所以抗日态度不坚决，面对日寇步步紧逼，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大半个中国都沦陷了，居然还没有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国民政府才紧跟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在此之前，蒋介石多次派代表秘密与日方接触，商谈停战。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的危机空前严重，中国抗日战争极有可能半途而废。为打破日军企图，坚定蒋介石的抵抗意志，必须给日寇重重一击，让投降派看到抗日军民的力量，看到胜利的希望。共产党八路军组织的百团大战产生了重要的战略影响，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力量，支援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使处于紧急关头摇摆不定的蒋介石放弃投降，日军的诱降最终失败。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停止

了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转而将主力用于围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日军对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扫荡”和“蚕食”，并大力修建铁路公路，新增据点，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对此，刘伯承曾一针见血揭露了日军“囚笼政策”的实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思想战”。为针锋相对地打击敌人，交通总破袭战是我军百团大战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军各部于1940年8月20日夜，同时对敌重要铁路、公路和主要生产区发起奇袭。广大抗日军民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座桥梁”“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等口号，采取搬拆、爆破、火烧、水淹等方法，有效破坏了交通线，使日军在华北的交通陷于瘫痪。由于百团大战打到了日军痛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将其称为“挖心战”，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俊因“囚笼政策”的失败被撤职。

百团大战发展了我军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军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百团大战中，我军各级指战员

摸索出许多新战法，极大推动了我军战略战术的创新发展。除大量运用我军本就擅长的游击战战法外，还在有利条件下，通过攻坚战、围歼战等战法歼敌夺地。比如，突袭娘子关的战斗中，日军利用天险修建了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我军主攻部队一部潜入娘子关村，依托村庄仰攻敌阵，战士们迎火网，攀陡坡，经3小时的反复冲杀，将守敌大部歼灭，夺占了娘子关。在涞灵战役、榆辽战役中，我军还攻克了日军占据的车站等据点乃至县城等重要目标。战役后期反击敌报复性“扫荡”的作战中，我军灵活运用“袭扰”“诱敌”“伏击”“围困”等多种战法，始终保持“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赢得战役的最后胜利。

百团大战揭露了国民党的谎言污蔑。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敌后战场独立作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活跃在抗日前线的主力，抗击了58%以上的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予敌重大杀伤。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国民党顽固派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大肆造谣，污蔑共产党“消极抗日，游而不击”，只顾壮大自身实力与国民党争地盘等，在国际社会和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中产生了不

良影响。百团大战，八路军投入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战区之广，影响之大，在同一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屈指可数。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重创强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战果，大大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有力打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和污蔑，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这场胜利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提高了八路军的国际声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人心士气，推动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发展。

军民同心，胜利之本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纪念这场伟大胜利，更深切地感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丰功伟绩，更深刻地感受到伟大抗战精神的弥足珍贵。抗战期间，当我们整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熔岩地火般喷薄而出。

百团大战中，我军指战员上下同心，奋勇作战。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持在一线指挥作战。八路军第129师新编10旅旅长范子侠对部属说：“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决死第3纵队政委董天知、第386旅第16团团长沙家庆、第17团副团长吴隆著、新编第9旅第25团团长李林、第27团政治处主任王顺平等领导干部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在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感召鼓舞下，八路军官兵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以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兵民是胜利之本。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抗日群众的支援配合也是我们战胜强敌的力量源泉。为瘫痪日军交通线，河北省唐县3000余名民兵、正定县1000余名民兵及新乐民兵配合八路军，破坏了平汉路正定至新乐间的铁路，并两次炸毁沙河大桥。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抗日群众经常忍饥挨饿，采取“昼伏夜出、伪装藏匿”的方式，将弹药、粮食、军鞋等物资巧妙运往前线。为抢救八路军伤员，寿阳县上村自卫队员王蝉余等3人随军在火线抢救伤员，第一名队员牺牲了，第二名队员上去又牺牲了，第三名队员接着上，终于将伤员救了下来……在百团大战期间，此类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数不胜数。百团大战的胜利，证明了人民战争伟力无穷。

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尽，我们仍须保持清醒。当前，天下仍不太平。每一名中华儿女都要牢记历史教训，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本文图片均由《解放军画报》资料室提供）

史说新语

护送红军官兵出东江

■汤炎忠

为确保转移安全，高维全与省委特派员李涛等人经反复研究，制订了“四步走”护送方案：首先从海陆丰出发，在交通员护送下经偏僻山径到吉隆塘肚，接着至轮山山水塘，穿过莲蓬公路等抵达雁湖村；然后在雁湖村住宿一晚，准备干粮；最后出发至大鹏湾上船。此外，每批红军出港，雁湖村均要有一至两名战士随行掩护。

1928年10月，首次护送拉开帷幕，转移的是一批红二师官兵和文化名人，其中伤重的红二师党代表颜昌颐是重点护送对象。颜昌颐曾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在海陆丰战斗中多次负伤，此次受伤急需救治。在雁湖村战士的精心安排下，这批红军顺利抵达香港。

随后，第二批转移的是红二师部分官兵及红四师中的数十名国际友人。广州起义时，有200余名国际友人参加，其中不少随红四师转战海陆丰。红四师师长徐向前要求尽快转移他们，联络总站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成功完成了任务。

第三批转移的是红二师师长董朗及20余名战士。董朗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历经诸多战斗，功勋卓著。护送队伍在雁湖村休整一夜，次日清晨在高维全的护送下安全出港。

1929年1月，第四批护送任务展开，此次转移的是红四师师长徐向前、党代表刘校阁等官兵。考虑人员较多，为降低风险，队伍分两路行动。其中，徐向前一路经惠潮公路秘密乘车至樟木头，再乘火车抵港。另一路刘校阁等10余人，因意外未能及时与交通员取得联系而误入惠州城，不幸被捕牺牲。这次事件令联络站站的同志们痛心疾首，同时更加谨慎以确保后续任务万无一失。

1929年3月，最后一批红军安全转移。

在革命低潮之际，雁湖村交通情报联络总站历经艰辛，共安全转移200余名红军官兵和国际友人，圆满完成党中央和省委交办的任务，为革命星火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雁湖村也被誉为东江秘密转移的“红色通道”、延续革命星火的“生命线”。

棱锋伏地刺铁蹄

——中国古代障碍类器械（上篇）

■曹波

在守城作战中，迟滞和阻碍敌方进攻速度至关重要。为达成这一目标，城防设施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不断创新。古人不仅建造了坚固的城池主体，更在城池外围系统地设计了多层次阻敌体系，包括护城河、羊马墙、壕沟网络、隐蔽陷阱等复合型防御工事。这些设施通过空间延展与时间消耗的双重机制，有效削弱敌军的进攻势能。

基于静态防御设施的局限性，古人进一步研制出多种可移动的障碍类器械。这类装备兼具战术灵活性与攻防转换特性，可根据战场态势动态部署于关键节点。本篇首先介绍的障碍类器械，是小巧便携、布防简易、攻守皆可用的铁蒺藜。

铁蒺藜，又称扎马钉或鸡爪钉，其形仿自蒺藜科植物果实，由数根铁刺呈放射状分布构成，具有落地必有一刺朝上的特性，可广泛布设以刺伤敌方人马足部，有效迟滞敌军行动。据《墨子·备城门》和《六韬·虎韬》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铁蒺藜就已应用于城池防御体系。

秦汉时期，铁蒺藜发展为军队常规障碍器械，不仅用于道路、防御地带和城池周边的布防，部队驻营时也会在营区四周密集布设。陕西勉县出土的蜀汉时期铁蒺藜实物显示，当时主流形制为四尖刺结构，分大小两种规格。大的铁蒺藜尖长2.7厘米、重15克；小的铁蒺藜尖长1.5厘米、重约8克。至唐朝，出现了专用于守城的重型铁蒺藜，长度超过1尺，重量达50斤。

宋朝是铁蒺藜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多种变体，如布列水中的三尖铁菱角，散布陆地的八尖铁菱角，安装在木板上布设要道的地湿及专用于陷马坑的擗(chōu)蹄等。铁蒺藜这种简单高效的障碍器械不仅用于防御，在进攻作战中也有出色表现。宋金枣阳之战

中，宋将扈再兴夜袭时在城外暗设铁蒺藜，拂晓佯退诱敌，待金军人马脚踏铁蒺藜阵型大乱时反攻取胜，堪称经典战例。

明朝时期，军中使用铁蒺藜更为广泛，用法更为多样。戚家军将其标准化配置，每名战士携带10串（每串6个）铁蒺藜，通过中央孔洞穿绳，可快速在敌必经之路布设野营障碍。水战中，明军将铁蒺藜投掷敌船，对赤足作战的倭寇造成显著杀伤。此外，明军还研制出一种名叫“鬼箭”的蘸毒型铁蒺藜，用毒药处理后在要道布设，极大增强了阻滞效果。

虽然铁蒺藜杀伤力不及重型武器，但其障碍效能突出且便于使用。作为延续2000余年的经典军事装备，其现代衍生物——铁蒺藜网仍广泛应用于野战工事、军事管制区等场所，持续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



陈列于成都博物馆的东汉铁蒺藜。资料照片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